

# 中国出生人口下降,如何托举生育意愿 宝爸宝妈之烦恼:宝宝谁来带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先藕洁 韩 颀

呼

呵护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实现幼有所育,既是家庭关心的大事,也是国家重大民生事项。但生了娃没人带,双职工带娃难,成为年轻人普遍面临的育儿难题。上海以立法破解托育难题,给最柔软的群体以坚实的托付,引起广泛关注和期待。

2023年1月1日起,《上海市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成为全国首部探索将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整合立法的地方性法规。在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妇联兼职副主席黄绮看来,将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一体化立法,既规定了政府在学前教育和托育服务中的职责范围,也规定了学前教育和托育机构的场所、人员等标准和要求,这一创新立法具有启示价值和现实意义。

2017年,时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的黄绮就开始密切关注托育服务发展问题,2017年上海市两会上,她提交了《0至3岁的幼托难题亟须在政府主导下解决》的提案;2018年全国两会上,她提交了《将学前教育费用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延伸至3岁以下》的提案;2019年全国两会上,黄绮委员继续提交了《建立与完善0至3岁公共托育顶层设计的法律及政策的建议》的提案。

2023年1月中旬召开的上海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上,托育话题同样是黄绮委员关注的重点。她建议,在落实好《条例》、完善公办托育机构建设的同时,注重鼓励发展价格亲民、设施完善的民营托育机构,特别要重视社区托育,鼓励发展全日制、半日制及小时制等灵活托育方式。

黄绮注意到,有些家长要求托育机构安装摄像头,方便自己通过手机远程观看孩子的情况。她认为,这是家长没有安全感的体现,家长对托育机构的放心程度,取决于托育人员对孩子的负责程度。

调研中,黄绮发现,多数家庭都很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与开发,对托育服务的内容、时间、入托适合的年龄等要求,选择托育服务时更关注服务质量(包括机构资质、教师与工作人员资质、机构硬件设施等)。

托育机构存在不少问题,需求和资源难以匹配,家长需求不一,托育服务人员数量、质量双缺失;很多私营机构较难管理,一些非正规机构隐蔽、游离于相关部门的监管体系之外。黄绮说。

针对当前托育服务存在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史毅认为,可继续统筹优化整合学前教育和托育服务资源。在他看来,托育服务行业中机构类型众多、条件差别大,可通过有效监管引导机构按照标准规范执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入托孩子的安全,才能提高家庭对托育服务的信任感。

黄绮建议,解决托育难问题,还可根据家庭、社区的需求,分层分类设置不同托幼服务、不同托育模式的服务标准、准入门槛及监管标准,借助机构、社区、企业等为家庭提供保育、教育、托育等多元化早期服务。史毅分析说,目前托育机构的区位优势不均,多数城市的托育机构设立在距离社区较远的商业综合体,社区的服务设施符合托育机构建设标准的闲置空间资源较少,农村人口居住相对分散,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导致农村办托机构存在障碍。

建议通过立法方式保障三岁以下的婴幼儿免费享受托育、育儿指导等一系列服务。史毅认为,如今的托育服务更多聚焦于城市家庭,当前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尚未建立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他建议深入探索农村托育服务,密切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通过上门服务对监护人进行科学育儿培训。

在黄绮看来,生育后的养育、托育问题对身处职场的适婚年轻人来说尤为重要,目前婴幼儿入托难、入托贵与托育机构招生难、生存现状并存。若国家政策能优化解决托育难问题,实现幼有善育,对很多想生孩子但不敢生的年轻人,或许能提升其生育意愿。黄绮说。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托育服务能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有助于提高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史毅提醒,大规模推行市场化托育服务,如果价格不在普通家庭可承受范围之内,可能反而会降低再生育意愿。

黄绮建议,有关部门应积极开展托育相关立法工作调研,深入系统思考儿童早期教育的发展方向,出台优惠倾斜政策,通过减免收税、教育津贴等鼓励企业、机构、社会组织等一起兴办托幼服务机构,承担社会育儿责任。同时可在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加强托育人才建设。

邹北京的三孩之家犹如一个窗口,演绎着年轻宝爸宝妈的欢乐烦恼。生育、托育已并非个人乃至一个家庭之事,而是攸关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国事。

202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2021年年末减少85万人,这是中国人口多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的出生人口仅有2016年的53%。

2022年8月17日,国家卫健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透露的一项国内调查显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超过1/3的家庭有托育需求,但供给明显不足,特别是普惠性服务供不应求。

这一信息引起广泛关注,让当年轻家庭的托育之难浮出水面。



扫一扫观看视频



36岁宝妈李晓和丈夫陈逸然在陪伴两岁的儿子。 先藕洁/摄



34岁的宝妈邹北京育有三娃。 受访者供图



90后宝爸李华锡和他两岁的儿子。 受访者供图

告显示,家长送托的主要考虑因素为托育机构与家庭的距离和服务价格。

在三孩宝妈邹北京的观念中,孩子需要多去接触外面的世界,她特别希望能把孩子送进放心又能长知识的托儿所。女儿两岁半时,邹北京为她报了私立双语托育班,每月费用7900元。

随着双胞胎的到来,邹北京深感育儿费用压力山大。为减缓老人带娃压力,双胞胎20个月时,邹北京开始物色托育机构,我家附近几乎没有公立机构,私立机构每月最低也要7800元,结合家庭收入情况,邹北京选中一家连锁品牌托育机构,每月9800元。

9800元只是一个孩子的价格,两娃要付双倍入托费。每月近两万的价格让邹北京一家着实吃不消,慎重考虑后,她让婆婆带双胞胎儿子回石家庄老家上托育班,一家人过起了双城生活。

孩子开眼了,长胖了,还会自己穿鞋子。入托两周后,邹北京惊喜地发现,刚满两岁的双胞胎儿子飞速成长,不仅知道排队等候,还学会了简单的儿歌。如今,邹北京夫妇带着女儿在北京生活,每个周末,邹北京一家要进行一次大轮换,将女儿带去奶奶身边,再把双胞胎带回北京照顾。

让家里阿姨或老人每天带着两岁的孩子挤地铁、坐公车去入托显然不太合适。在宝爸陈逸然看来,离家距离是选择托育机构的重要指标之一。杨雯更倾向于选择公办托育机构和非营利托育机构提供的普惠性托育服务,价格亲民、质量有保障。

在工薪族李华锡看来,孩子的托育费用不应超过家庭总收入的30%。李晓则表示,如果托育机构环境佳、师资强、离家近,愿意为这些优质服务买单,但每月总支出不宜超过1.5万元。

## 解决托育之困亟须多方发力

2022年9月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负责人杜希学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目前我国托育机构面临降低成本难、稳定招生难,应对风险难等挑战。

回顾托育机构5年发展历程,90后宝妈辛静体会颇深。2017年,辛静与另一位宝妈联合创立了一所国际托教中心,致力于为0-3岁的婴幼儿及家庭提供科学的托育服务。

辛静感慨,房租和师资是压垮部分托育机构的两座大山。她说,国家政策对于托育场所的楼层、采光、通风等都有明确规定,这就决定了托育机构的场地租金普遍较高。

房租贵,人力成本更高。辛静介绍,目前她经营的托育机构里的师生比为1:3,托小班1.5,托大班1.7,受制于缺乏合格的托育人才,托育机构自身承担了大量的人才培养工作,经营成本难以压缩。

《报告》显示,2020年北京市托育机构平均月收费超过7000元,价格较高,运营成本中场地租金和人力成本占比达80.9%。辛静直言,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可以提供价格低廉的场地租赁,同时加大

## 这里的宝宝屋 可以让年轻父母享有宝贵的闲暇时光 上海:立法保障 最柔软的群体 实现 幼有善育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魏其霖

容的学前教育体系,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实现幼有善育。

值得关注的是,上海自1999年起开始探索建设0-6岁一体化管理体制机制。2018年,上海在全国率先制定出台托育服务指导意见和行动方案,推动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和2020年发布《上海市托育服务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提出新增普惠性托育点等举措。上海市教委托幼处处长孙鸿表示,《条例》强化了学前教育、支持生育政策,旨在破解上海学前教育托育服务发展中的一些瓶颈问题,同时以地方立法形式固化上海的有效经验和特色。

关注0-3岁幼儿,建立社区托育点提供临时照料服务,是此次立法的一大亮点。

《条例》出台之前,上海市教委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本市社区托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针对上海市十四五期间的社区托育服务制订工作计划,要求坚持政府主导、安全普惠、属地管理、多方参与、就近就便原则,在社区内设置嵌入式、标准化的托育服务设施,提供临时托、计时托等普惠托育服务。

按照《意见》,十四五期间,上海要以街坊为规划单元,开设社区宝宝屋,按照街坊1-3岁常住幼儿人数的15%配置宝宝屋托额,其中五个新城地区按不少于20%的比例配置;全市街坊宝宝屋覆盖率达到85%,中心城区街坊宝宝屋覆盖率达到100%。2023年,上海要全面建设社区托育点,并开设更多的公办幼儿园托班,2025年达到千人托位不少于4.5个。《意见》还就经费保障、人员保障等方面具体问题提出了规划。

据了解,浦东新区正引导和支持各类机构依托社区提供嵌入式、菜单式、分龄式的普惠婴幼儿照护服务,推动街坊建设社区宝宝屋。曹路镇正开展试点,在中虹社区居委会的文化客厅里嵌入宝宝屋功能,年轻父母可以将宝宝临时交给保育员,自己处理工作,享受一会儿闲暇时光;长辈可以在去社区居委会看病、买菜、聊天聚会时,临时将孩子交给保育员,可以透过窗口观看孩子在宝宝屋的游戏情况,社区居委会充分挖掘、利用社区的人力资源,聘请

居住在社区内的3个有照护资质的全职妈妈作为宝宝屋的保育员。

上海地方立法的出台,有效促进了基层强化托育服务的政府职责与组织保障。



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街道宝宝屋,为社区内有需求的幼儿提供临时照料服务。 上海市教委供图

管理效率,同时提供针对托育人员的保研活动、教研活动、培训见习、从业人员技能大赛等多元化服务机制,助力托育园的健康发展。

立法保障科学育儿指导,是《条例》的另一大亮点。《条例》明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接受科学育儿指导,创造良好家庭环境,科学开展家庭照护和教育;区人民政府应当将社区托育服务和家庭教育指导纳入15分钟社区生活圈、乡村社区生活圈和社区综合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据介绍,上海目前已覆盖0-8岁幼儿家庭教育的科学育儿纳入全市一网通办,出生一件事,不断扩大育儿指导的覆盖面、提高指导服务的精准度,每年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10次公益免费科学育儿指导。同时,通过进楼宇、进园区、进场馆、进社区、进家庭的“五进”模式,把科学育儿资源送到家长身边,通过育有道App和上海科学育儿指导服务平台,及时推送内容丰富的服务信息,有效支持家长居家育儿。